

伍爾芙 (Virginia Woolf) 闡發而頗具深義。布魯姆童年時就閱讀了伍爾芙的散文集《普通讀者續集》(The *Second Common Reader*)，對其中談及「普通讀者」應該如何閱讀的一個段落記憶深刻、奉為信條，並極力敦促自己及有識之士身體力行。伍爾芙說：

然而，誰讀書又是為了達到甚麼目的呢，不管這目的多麼可取？我們的某些追求難道不是因為它們本身

的美妙和樂趣嗎？閱讀不就是這樣一種追求嗎？我至少時常夢見，當審判日來臨的那一天，當那些偉大的征服者、律師及政客們最終接過他們的獎賞時——他們的權杖、他們的桂冠、他們的名字被永世不滅地鐫刻於大理石——萬能的造物主（當他看見我們胳膊下夾着書本走向他時，他的心中不無羨慕）會轉身向聖徒彼得說，「看，這些人不需要獎賞。我們這兒沒有可以給予他們的東西。他們已經愛上了閱讀。」（頁349）

基督教與自由主義的起源

● 喻 中



叢日雲：《在上帝與愷撒之間——基督教二元政治觀與近代自由主義》（北京：三聯書店，2003）。

二十世紀初，經由嚴復之手，密爾 (John Stuart Mill) 的《論自由》(On Liberty) 遠涉重洋來到東土。在那個年代，國門雖然已經洞開，新鮮的事物雖然已開始潮水般地湧入，但是，當中國人首次遭遇到西方文化傳統中的「自由」一詞，還是像突然間碰上了一個素未謀面的陌生人一樣，一時還不知道如何稱呼。所以，在嚴復的筆下，「論自由」就被處理成為了精妙傳神的「群己權界論」。自此以後，一個幽靈，一個自由主義的幽靈，就開始在中國的大地上徘徊。百年以降，有人為它辯護，也有人表示質疑，聚訟紛紜，時起時伏，莫衷一是，於今為烈。

幾乎所有圍繞着自由主義的論爭，都會直接或間接地逼出一個基

叢日雲把基督教的二元政治觀與自由主義聯繫起來，得出了一個引人注目的結論：自由主義就是從基督教這個政治文化母體中孕育起來的，是在與基督教這個母體的廝打與搏鬥中誕生的。這個結論對於中國人的流行觀念，構成了一定程度的衝擊與挑戰。

基礎性的問題：自由主義是怎樣產生的？然而，恰恰是在這個基礎性的問題上，中國學者都沒有給予足夠的關注。在當代中國，顧準、李強、郁建興都曾論及自由主義，但對自由主義思想的起源大多語焉不詳。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叢日雲先生展開了一項探索性的研究，完成了一本專題性的著作：《在上帝與愷撒之間——基督教二元政治觀與近代自由主義》（北京：三聯書店，2003）。在這本著作中，作者把基督教的二元政治觀與自由主義聯繫起來，得出了一個引人注目的結論：自由主義就是從基督教這個政治文化母體中孕育起來的，就是在與基督教這個母體的廝打與搏鬥中誕生的。

這個結論對於中國人的流行觀念，構成了一定程度的衝擊與挑戰。因為，在當代中國的普遍意識中，基督教已經成為了灰暗、愚昧的代名詞，它怎麼可能孕育出理性的自由主義呢？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一文中，馬克思不是早就給出了一個「說法」嗎？——作為一種「顛倒了的世界觀」，「宗教的苦難既是現實苦難的表現，又是對這種現實苦難的抗議。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歎息，是無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沒有精神狀態的精神一樣。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因此，「對宗教的批判就是對苦難世界——宗教是它的靈光圈——的批判的胚胎。」（馬克思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頁1-2。）

在馬克思眼裏，「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但在阿克頓（Acton）看

來，「宗教是歷史的鑰匙」。正是靠着這把「鑰匙」，叢日雲先生給我們打開了一扇門，使我們看到了自由主義源頭地帶的風景，並從中理解了自由主義孕育誕生的過程。

叢日雲先生注意到，在基督教產生之前，雖然也有二元主義世界觀的萌芽，比如，柏拉圖較早地闡述過理念世界與現實世界的對立，斯多葛學派（Stoicism）的倫理哲學也曾凸顯過靈魂與肉體的差異。但是，真正將人的肉體與靈魂的區分賦予了重大意義的還是基督教。

按照基督教的教義，人被劃分為靈魂和肉體兩個部分，人的生活也被分解為宗教生活與世俗生活、天堂和塵世、彼岸與此岸兩個領域和兩種境界。從人的這種二重性觀念出發，一道鴻溝將社會劈成兩半：社會主體被分為兩個等級：屬靈等級（教士）與屬世等級（信徒）；社會組織被分為教會和國家；政治權力體系被分為精神權力與世俗權力、教權與王權，它們分別由教皇與皇帝、主教與王公掌管；法律體系也一分为二，即教會法與世俗法，在理論上，它們都要服從神法和自然法；而司法權力也有兩個中心，即主教法庭和領主法庭（或王室法庭），與此相應的是，人的社會角色也被分裂為教徒與臣民（或公民）。這便是基督教在西方確立的政治秩序：政治權力雙峰對峙，政治資源二水分流，普通民眾一僕二主。整個社會的這種二元裂變還伴隨着一系列的象徵性符號：在每個國家，都形成王冠與聖壇兩個焦點；歐洲大地被封建莊園的護欄與修道院的圍牆所分割；貴族的城堡與主教的教堂在歐洲上空遙相呼

應；騎士與聖徒同時成為詩人謳歌的偶像。

這種二元主義的政治觀雖然形成於中世紀，但它的精神和影響並沒有隨着基督教時代的消逝而消失，而是藉着自由主義這種新的思想載體得以流傳下來。因此，在中世紀的盡頭，人們看到了一種新的二元政治觀浮出水面，這就是近代自由主義的二元政治觀。在它的主宰下，西方社會繼續承受着新的二元裂變：一種宇宙的二元論、人的二元論、社會的二元論以及政治的二元論仍然處於西方文明的核心。尤其是在政治領域，自由主義堅持在人的內在與外在世界、私人生活與公共生活、私域與公域、公民社會與政治國家、個人與社會、自由與權威、個人權利與國家權力之間的二元分離與對立。這種二元分裂與張力，就是近代自由主義的精髓，它的源頭，就是基督教的二元政治觀。

在近代自由主義的話語體系中，人們普遍承認，自由主義的邏輯起點與精神實質是個人主義，而個人主義又是以張揚個人權利與個體自由作為目的和歸宿的。在眾多的經典著作中，個人的權利與自由好像是與生俱來、不言而喻的，似乎不需要為個體的權利與自由提供額外的論證。但是，叢日雲卻發現，個體神聖、個人權利、個性自由的最終依據，就隱藏在基督教的教義體系中。其核心思路，是把人劈成兩半：人的靈魂與肉體、內在與外在世界、精神生活與世俗生活、來世命運與現世境遇、天堂幸福與世俗幸福。基督教通過把前者從後者中剝離出來，並與上帝之

間建立起直接的聯繫，從而賦予人的精神世界、精神生命以某種高於世俗秩序的神聖意義和超脫世俗秩序的獨立價值。由此，基督教將人的內在精神生命的價值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並通過對上帝的信仰而為它奠定了堅實的精神基礎；它的超越主義的價值取向使人們以一種全新的尊嚴的態度對待世俗社會和國家，從而賦予國家以工具性價值；它從有機的整體主義的世俗社會中，將人的精神生活剝離出來，賦予其獨立性和個體性特徵。可見，將個人及其彼岸命運置於政治秩序之上，賦予其目的性意義，是基督教思想發展的必然結果。

在神聖的個人面前，國家的神聖性不復存在。一方面，它僅僅是價值上的中性之物、低俗之物、外在之物或赤裸裸的權力組織；另一方面，國家起源於人的墮落，是對人類之罪的懲罰和補救，一切道德的、審美的與精神的美好價值都不屬於它，它只是人們按「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原則所作出的選擇，是不可避免的禍害。因此，國家只能承擔消極的、防範性的、保障性的、低層次的職能，其目的僅僅在於為個人的自由與權利服務。

個人第一，國家第二；國家是由個人定義的，國家也是為個人服務的。這既是基督教教義的邏輯結果，也是自由主義的邏輯起點。正是在基督教的母體中，自由主義呱呱墜地。

通過這樣的上下求索，叢日雲先生打通了基督教研究與政治學研究，並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新鮮的資訊：自由主義源出於基督教。初讀本書，筆者就感受到這個資訊所帶

在中世紀的盡頭，西方社會繼續承受着新的二元裂變。一種新的二元政治觀浮出水面：堅持在人的內在與外在世界、私人生活與公共生活、公民社會與政治國家、個人與社會、自由與權威、個人權利與國家權力之間的二元分離與對立。這種二元分裂與張力，就是近代自由主義的精髓，它的源頭，就是基督教的二元政治觀。

國家是由個人定義的，也是為個人服務的。這既是基督教教義的邏輯結果，也是自由主義的邏輯起點。值得進一步深思的是基督教與自由主義的內在聯繫，近現代西方各種新事物的誕生，幾乎都可以看到基督教的碩大身影。近代自由主義與基督教之間存在着邏輯上或歷史上的關聯，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來的衝擊力。然而，就這個主題進行反覆思考之後，筆者還發現了一個值得進一步深思的問題：基督教與自由主義的內在聯繫，到底應當在意料之外，還是應當在情理之中？

筆者提出這樣一個疑問，實在是因為，基督教乃是一個龐大的事物，在中世紀的歐洲社會，它幾乎籠罩了一切，幾乎沒有哪一個領域可以徹底擺脫基督教的影響。比如，在法律史家伯爾曼 (Harold Joseph Berman) 的《法律與革命》(*Law and Revolution: The Formation of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法律與宗教》(*The Interaction of Law and Religion*) 等著作中，西方的現代法律就起源於十一世紀的教皇革命，這就等於宣告：現代法律起源於基督教。以此類推，人們也可以通過旁徵博引，認定近代西方的社會契約論就是源於基督教中的「約」的觀念，近代西方的三權分立論就

是源於基督教中的「三位一體說」，韋伯所謂的「資本主義精神」則源於「新教倫理」，等等之類，不一而足。按照這樣的套路來一一加以檢視，人們也許就會發現，近現代西方世界的各種事物，甚至包括自由主義的對立物 (比如，對異端的審判與制裁)，在它們孕育、誕生的時候，幾乎都可以看到基督教的碩大身影。既然如此，近代自由主義與基督教之間存在着邏輯上或歷史上的關聯，也許就在情理之中了。

從這個意義上說，叢日雲先生的著作主要是在一個具有普遍性的規律之內，又增加了一則例證、一起個案。通過這本著作，人們也許會更加相信阿克頓的名言：「宗教是歷史的鑰匙」。憑着這把神奇的萬能「鑰匙」，既可以獲悉自由主義孕育誕生的秘密，似乎也可以揭示近現代一切事物孕育誕生的秘密。筆者作出如此推演，但願沒有低估叢著的應有價值吧？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目錄

2006年10月號、11月號

第55期 2006.10.31

- 葛玲、辛逸 政策偏向與1959-1961年農村饑荒——以糧食分配政策為中心的考察
- 王海光 反「文革」檄文《給全體共產黨員的緊急呼籲》解讀和考辨
- 王 銳 「安亭事件」的再認識和再研究
- 王炯華 略論中國國民黨之社會民主黨性質
- 郭培清 大陸之外中以軍事貿易關係研究綜述
- 吳德波、王芳 政治中的多元主義——馬基雅維里德行觀的展開
- 何宏光、范曉光 新時期農村社會動員的考察——基於華東某明星村新農村建設的調查
- 王建平 前衛鏡像下中國城市中產階級的消費張力
- 郭紹敏 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研究與中國問題意識——讀《殷海光·林毓生書信錄》
- 姚朝文 粵港澳舞獅、舞龍民俗藝術的詩學意義——粵港澳功夫影視中珠三角民眾的習俗與精神寄託

- 鄧燕華 管中窺豹：消費革命靜悄悄——讀《金拱向東：麥當勞在東亞》

第56期 2006.11.30

- 董國強 1967年夏天南京「倒許」風潮的台前幕後
- 丁曉杰 盧溝橋事變前後日本對西部內蒙古政策之變化
- 詹德斌 韓國新村運動的起因及作用再考察
- 吳海清、張建珍 全球化語境中邊緣表達的焦慮——《千里走單騎》的全球化想像及其權力結構
- 席天揚 從邏輯實證主義到徹底的概率主義——理查德·傑弗利的學術生涯
- 潘國靈 以互聯網為題材的中文歌曲
- 王宏志、關詩珮 多角度「共同研究梁啟超」——從「日本在中國接受西方近代思想中的作用——以梁啟超為例」說起
- 秦文佳 暮色中的光明——讀《變化中的中國人》